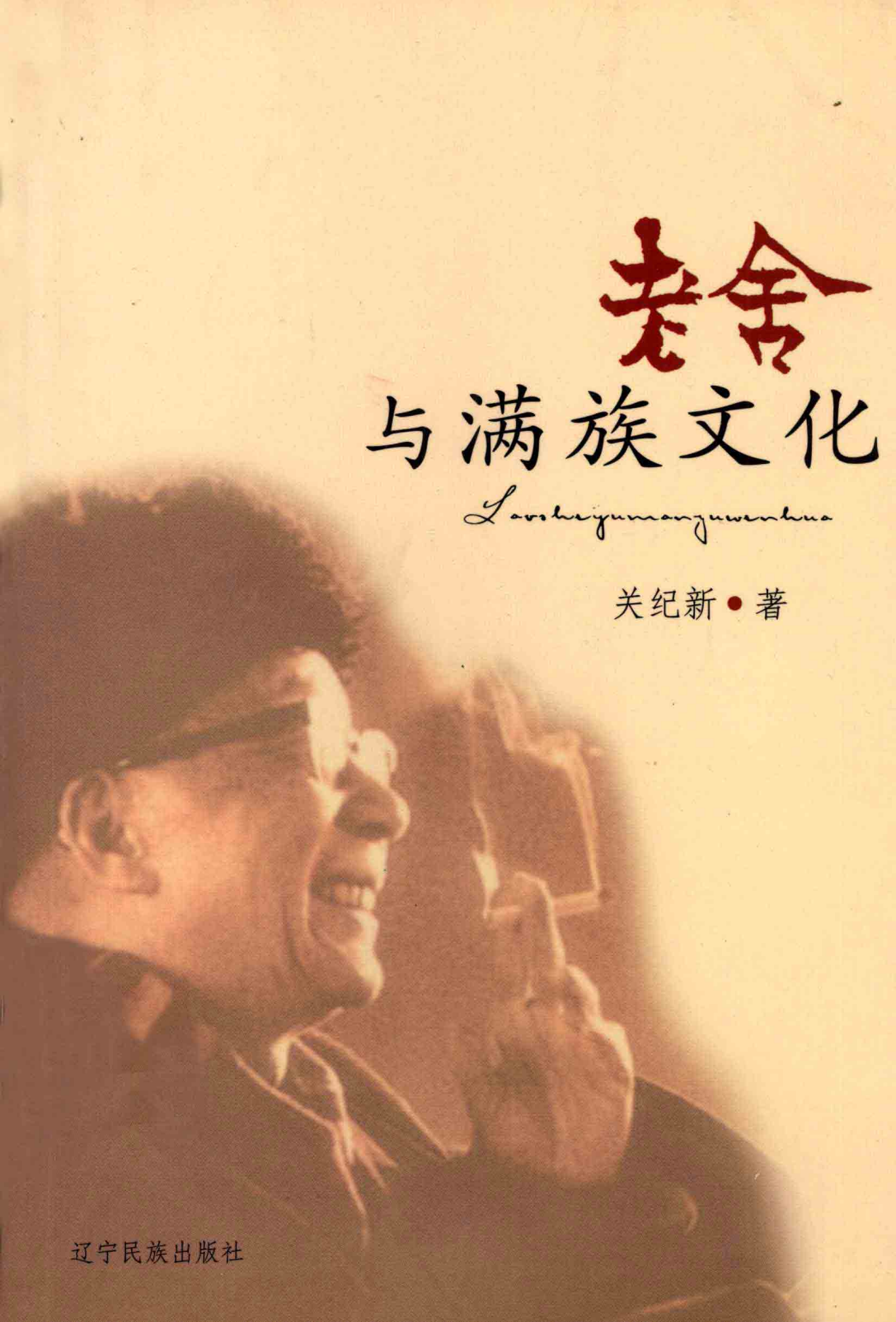




老舍 与满族文化

Lao she yu man zhu wen hua

关纪新 •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老舍 与满族文化

Laoshe yu manzu wenhua

关纪新·著

© 关纪新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与满族文化 / 关纪新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722-597-3

I. 老… II. 关… III. ①满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②老舍 (1899~1966) —生平事迹 IV. K825.6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169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0 $\frac{3}{8}$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于 浪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在 20 世纪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众多优秀作家里面，老舍，也许是最为广大读者民众所熟知的。他的贫寒出身、他多产的创作生涯、他的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之类极得大众好评的作品，乃至那非同凡响的人生结局……都是下自黎民百姓上至学人教授们经久谈论的话题。从常见的角度来看，老舍，似乎早已无奥秘可言，从人生到作品，好像可以被认为是再不存在什么理解障碍与认识盲区了。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笔者以为，对老舍“黑匣子”的解密工作虽经研究界的多年努力而收效多多，却还不能说是已经接近功成之日。老舍，还远不是一位不再存有社会历史遮蔽和文化艺术密码的、可以叫人们一览无余的作家。

可以从读者时常谈到的老舍的某些创作特征来说起，他的作品：

- 始终坚守着“国家至上”的原则；
- 异常关注着国人们的道德心理走势；
- 总是表现出浓重的“恋京”情结；
- 专写并且擅写旧日北京下层市民的凄苦命运；

——在语言运用上特别倚重于“京腔京韵”；

——笔下写的大多是悲剧，作品却充斥着幽默优雅的格调；

——除了小说、话剧等主攻门类之外，在曲艺、小品文、散文、新诗旧体诗、戏曲、文论等方面也多有建树，而且这方方面面的作品又总是那么明显的大俗大雅、雅俗浑然……

上述这些使老舍之为老舍的特点，或者有的简直就是老舍独一无二的“绝活”，人们多半是只知晓其然而未深究过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对于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坛上何以能够艺术上独树一帜的个中缘由，他的读者和观众怕是还缺乏深入一个层面的挖掘及体认。

真正要想彻底解读老舍的艺术“黑匣子”，仍然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们继续付出不懈的劳作。笔者作为老舍学术研究领域一位多年的从业者，愿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将在本书题目之下的相关心得捧献出来，以期求得专家们的指点及同人间切磋。

目 录

MULU

书首絮语	1
第一章 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老舍的 人文模塑	1
第二章 20 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 民族心理的制约	28
第三章 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 精神烙印	58
第四章 故土难离, 相知不弃——老舍的 京旗及北京情结	98
第五章 老舍赖以托足的满族 文化艺术沃壤	131
第六章 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 烹炼琢磨	174
第七章 老舍文学艺术之中的 满族文化调式	222
第八章 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 忧思与自省	264
跋	312
本书写作主要参考文献	323

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 对老舍的人文模塑

老舍是个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本中均有交代。那么，“满族”二字，对于作家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在户口簿一个具体栏目的填写上跟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认真想过。

满族作为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差不多的人都是知道的^①。但这个民族除去建立过清王朝而外还做过一些什么，人们却不甚了了。按说，不很了解我们国内某个具体的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也还是个相当常见的现象，算不得什么。然而，当我们面对着杰出作家老舍并且希望对他有些深入把握之际，假使不了解满族，却肯定得说是一重障碍。当下，对老舍其人其文颇感兴趣的人非常之多，笔者常与他们说起，若不能比较系统地了解满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又想切实地走近老舍、认识老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断非危言耸听，因为老舍及其艺术之功，委实是与他所出身的那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此言不妄。因为它所阐释的，正是生存环境对人的精神养成所具有的潜在规定性。老舍出身于清代末年京师内城一个满洲下层旗兵的家庭，父亲战死于反侵略的战场

① 目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认定的少数民族有 55 个，满族是其中之一。相对于其他某些少数民族来说，满族的“知名度”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该民族的统治者建立过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缘故。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主体民族汉族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90% 以上。在国内汉族人口居多的许多地区，主体民族成员有时会在不经意之间忽略了兄弟民族的现实存在。在笔者看来，尚有待于在国民中间进一步开展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 56 个民族都对缔造祖国的灿烂文化作出了贡献的思想教育。



满族作家老舍

而使他幼年失怙，母亲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并且把民族的价值观念传授与他，满人的精神血脉自幼便流灌于他的头脑与肌体，从而完成了其基础人格的模塑与定型。

需要首先在这儿为大家勾画的，是老舍所隶属的民族——满族的基本背景与轮廓。

满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先民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中的一部分。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舜、禹时代，满族的初民肃慎人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生活在祖国东北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

满族的先民，以自然经济为生存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历史上长久维系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既是其物质生活基础，成为使该民族得以世代繁衍生息之保障，也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基础，使该民族成员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与行为准则。据民族心理学的一项研究结论证实，较之于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成员们更少保守观念、更多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①。况且，东北亚地区山岭纵横、地广人稀，

^① 张世富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中谈到：“著名人类心理学家卡丁纳（A.Kardiner）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的文化经验的基本人格。社会上成年人的人格应该是由共同的文化经验塑造的，这种共同的人格倾向产生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及育儿习惯有关。基本的人格结构又反过来产生文化的诸方面，现在经常运用的‘基本个性’、‘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均是指某一社会中存在着的一套典型的个性特征。卡丁纳提出的这些观点被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田野工作得到了证实。如巴里（H.Barry）和培根（M.Bacon）提出，在畜牧和农业社会里，未来食物最可靠的保证是坚持既定的放牧和

冬季长期高寒，夏天日照强烈，满族先人世代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便同时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惧艰险、粗犷剽悍、勇猛奔放的民族性格。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主要依赖自然物产为衣食之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以去与自然力抗衡，便在民族心理的深处生就了敬畏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特有心态。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认定世间万物有灵，就是由此而获取的精神依托。民族先人们在长期从事艰险的渔猎经济生产实践中，笃信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体现这一宗教观念、讲述世间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便特别地丰富发达与瑰丽多姿。这一情景，不仅养成了该民族异乎寻常的对于文化艺术的想象力，也使他们世代葆有着创编及接受带有奇思异想的民间叙事文学的嗜好。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汉文典籍《左传》中，曾有关于“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证实了满族初民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随后的肃慎后裔、满族先民，又曾以挹娄（秦汉时期）、勿吉（南北朝时期）、靺鞨（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见知于世。在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族的粟末部融白山部及高丽遗民，曾经在今吉林一带建立国力颇强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经济文化直追中原同时代的盛唐。到了公元12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朝，又曾立国120余年，与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其疆域东北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今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

耕作常规，因为一旦失误就会影响一年的食物来源。但是在大多数渔猎社会中，一时失误只会影响一天的食物来源，因此墨守成规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就有可能鼓励人们的创造活动。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农业社会培养的儿童往往强调顺从与责任，而渔猎社会往往强调独立与自力更生。”（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第4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横山和甘肃东部与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划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时期，其辖域内还呈现过为史乘所夸赞的盛世景象。

作为肃慎后裔和满族先民的民族成分，其历史性展开不是单线条的。“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人失散开来，有些进入朝鲜半岛，离开了女真群体。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原来不太发达的黑水靺鞨，则成了后来金代女真群体的基本先民。至金代被元朝灭亡后，金代的女真人也多数散落于关内的冀鲁豫地区，融合到当地的汉族中间；金代女真成分真正返回东北故乡的并不多。而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又是后来重新再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的先前发展比较滞后的女真群体，他们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虽说“渤海国”的靺鞨人和金代的女真人都未成为满族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的不同后裔成分所留下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文化史实，却每每说明白山黑水间肃慎古族的流脉具备高度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如果我们说，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期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已经为肃慎古族的另一流脉即明末女真族——满族，在中华封建历史的末叶横空出世，再造出一段历史的辉煌，埋下了前定的伏笔，也许并不为过。因为，这一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族群，总是富有创造力和自立精神，勇敢粗犷，不畏艰险，又特别具有文化想象力和实践精神，他们在相似历史境况下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进取并且获得成功，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新崛起的原本在发展中处于后进状态的女真人，他们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这些女真人分批先后南下，形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女真三大部。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战乱不已，彼此残杀，民众蒙受极大痛苦。16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首领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趋势及民心所向，肩负起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此后，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

下，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邻近的蒙古和朝鲜，击溃明王朝用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夺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使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宣布更改女真旧族称为“满洲”，还将所用国号“金”也变更为“清”。

之所以要为本民族重新命名，是出于目的与策略相结合的选择。随着政治军事的推进，其民族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已成定势。于是，皇太极便以女真民族为主体，吸收周边一些追随其政权较久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成分，建构起来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在努尔哈赤时期，曾沿用历史上的“女真”民族和“金”政权的称谓，而这两个称谓在中原人们的记忆中是敏感的，为了消解夺取中央政权的阻力，更多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必要修正本民族形象以适应形势需求。当然，更改族称之举，也体现出了实施者对他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认同倾向。自此，满族人不再一味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表现出一种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姿态。

“满洲”，是一个满语单词的音译，并不是地名。而“满族”只是“满洲族”在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简称。“满洲”一词据说是有着梵文“妙吉祥”之意（更名“满洲”之际该民族已经出现了佛教信仰）。

公元1644年，由满洲贵族执掌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迅即向全国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中国268年的历史。

清代的满人常常被世间称为“旗人”。其实，所谓“旗人”是个大于满人的称谓，在有清一代，“旗人”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民一体化组织中人口的总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八种不同旗帜为标识的

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①。后来，随着政治军事需要，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和识别方式，建立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旗满洲将士造像

清初，八旗兵民一体的组织创建时，正值该民族的精神上升期，发愤自强、争立功业，成了整个民族的追求。八旗将士人人勇武争先，共襄进取大业，出现过许多令后人惊讶、羡慕的历史场景。清初满族诗人佛伦写过一首《从军行》，体现的正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民族气概：“神龙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试剑锋，白羽装箭筈。矫首视天狼，奋欲吞么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

① 起初只有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的四种旗帜和四个方面军，后来随着军队的扩充，四个方面军演变为八个方面军。新出现的四个方面军，便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上分别镶缀上其他颜色的边，作为各自的标识。这样，先前分别以黄、白、红、蓝四种单一颜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便被称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而以后来加上了镶边的四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则分别称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满人初学汉文书写时，嫌“整”字笔画繁琐，往往将它简写作“正”，不了解原委的人们后来经常把整黄旗、整白旗的“整”字由汉语“zheng”音的第三声误读成第四声；更有甚者，后来书写时也有嫌“镶”字繁琐而写作“厢”的（至今京郊一些地名即如是），更造成了又一层的误解：以为“正黄旗”必是高于“厢黄旗”（因为“正中”该居于“两厢”之上）……其实，八旗顺序以镶黄旗为首，之下才是整黄旗等。

亲朋劳祖钱，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雷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①在这种上下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作用下，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洋溢着蓬勃生机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已急剧滑落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给民众一个在安定富足中繁衍生息的较长时间，中国人口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40000万。如果没有满族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前期的戮力经营，从而达成清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大局面，后来的中国是难以渡过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灭亡我文明古国这一道险关的。

随着清初百年左右的平息反清势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荡准噶尔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八旗将士被一批批地派往国内各地，作战与驻防。至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已有130多处。满族人因此而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广大区域，除了北京作为八旗军的大本营之外，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清代乃中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历史时期^②。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确定下来的^③。清初百年间，我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都被切实地管理起来，国土面积达到了1250万平方公里。

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维护国家利益前赴后继

① 不妨将这首诗与在中原世代流传的诸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妻子儿女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一类的诗句两相比照，即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族群间的反映，是何等地不同。

② 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地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版图所有有效化。

③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都对此有过肯定的表述。

英勇参战，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除上述清代初年的战事以外，中期尚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战事；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满族官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比比皆是，史书上多有记载。在入关之后，满族又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早期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和稍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在清代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战国策》中有《触刼说赵太后》文，认为历史上一向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肇始，连续数代奋发图强，成功地逸出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此外，由八旗满洲中间涌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其他方面的优秀人物，也是不胜枚举的^①。

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族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铸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然而，其制度自身却孕育着难以排解的潜在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对旗人们的约束是相当严苛的，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唯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此制度的人始料不及的社会难题。从雍正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就渐出端倪，其后愈演愈烈，统治者煞费苦心力图解决它，却终告不治：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②，

① 可参阅《清代八旗贤宦》（滕绍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史学著作。

② 《满族简史》，第10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既没有营生也没有收入的“闲散旗人”（满语叫做“苏拉”），这就不仅导致了許多下层旗人家庭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①，还使人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却了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因此，正是八旗制度，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在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最为悲哀的是，到了辛亥之后，世代远离农桑工贾等谋生技能的满族人，陡然间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逢全社会的舆论和环境都对他們极为不利，八旗制度制约下的末代旗族百姓，便比他們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所以，说满族是“成也八旗制，亡也八旗制”，不无道理。

二

以上，我们用极粗略的线条，勾勒出了满族大致的背景和轮廓。

老舍，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当中。在笔者看来，满族历史、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几乎各个侧面，都曾经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老舍的人格模塑以及精神世界的形成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元1899年2月3日（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在北京城（当时又称为“京师”）内西北部一条叫做“小羊圈”的胡

^① 清军入关之际，因军事需要，满人男性16至60岁（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须应征入伍，成为甲兵。按照八旗制度规定，被挑为甲兵的旗人可按月领饷。饷分为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统称为“钱粮”。而钱粮是只发放给甲兵的，未经挑甲的闲散旗人以及妇女是没有饷的，他们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钱粮来养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后期，下层旗人家庭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闲散旗人愈多，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便愈发地严重。

同，一户贫苦的下层旗兵家庭里，出生了一名羸弱的男婴。他就是老舍^①。

老舍的家族姓舒。父亲名永寿，是正红旗满洲^②属下的一名“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皇城、王府以及整个京师的日常安全。如果皇上外出巡幸，也要由京师护军抽调一部分兵力护驾。其责任不可谓不大。如果从具体的分工来说，被称为“上三旗”的镶黄、正黄、正白旗护军，是紫禁城的卫戍部

① 老舍出生那天，正值农历戊戌年的腊月二十三，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小年”，按照本家族排辈分的用字，他这一代的男孩子应是“庆”字辈，他生在春节临近的时候，父亲于是给他起名“庆春”。后来在读书期间，他又为自己确定了字“舍予”。而“老舍”则是他后来登上文坛期间所使用的笔名。

② 因为迄今没有任何老舍一家历史上的满族姓氏究竟是什么的确切材料，笔者认为，老舍家族先前的满族旧姓氏尚待考证。满族先民的姓氏，大约有六百余个。就像汉族人的多用姓氏张、王、李、刘、陈等一样，满族也有几个传统的姓氏，使用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的“满族八大姓”。这八大姓氏是哪八个似无定论，其中一种说法，是指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董鄂氏、马佳氏、纳喇氏、索绰罗氏和伊尔根觉罗氏。到了清代晚期，原来用汉字记录满语多音节译音的满人姓氏，多简化为用一个汉字来替代，比如前述“八大姓”，便大致改用了汉字的关、郎、舒、董、马、那、索、赵。——也许正是因为排在这中间第三位的舒姓，恰好就是老舍一家这时业已冠用的汉字姓氏，故而产生了他们家的满族旧姓是舒穆禄氏的猜测。其实，这种猜测尚难以确证。满族姓氏的演化规律，既有原来冠同一满姓的人们改用几种汉字姓的情形（例如各地各家族的舒穆禄氏，后来分别改用了汉字舒、徐、米、宿、孙、郑、萧、万等为姓），还存在后来虽改用同一汉字姓的满人，却来自满族不同姓氏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中间，也包括了这个后来改为单个汉字的“舒”姓：不仅从前“八大姓”中的舒穆禄氏的一部分改姓了舒，另有舒舒觉罗氏和舒佳氏，也改姓了舒。可见，老舍一家的旧时满姓尚有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佳氏等不少于三种的可能性。因为舒穆禄氏以前是个大姓氏，所以他家出自其中的可能性也许要更大一些。不过，出身于北京满族的人文史大家启功先生，却在他的相关著述中认定老舍家族原来的满族姓氏为舒舒觉罗。在《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他说：“‘觉罗’是根据满语 *gioro* 的音译，它原来有独立的意思。……清朝，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在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不过，启功并未详细说明他认为老舍家族原来是姓舒舒觉罗进一步的根据。

队，被称为“下五旗”的镶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旗护军，则分别负责保卫京师全城的安定。永寿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护军甲兵（也可以简称为“护军”），他的岗位常常是在京师城门的周近。

清末时节，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世人久已习惯以“旗族”^①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总态势之下，“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也已历经了好多代。永寿的家庭，不知是从哪一辈人起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命运圈子。

“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

满人在历史上是用满语命名的。从清中期起，沾染了汉族文化习气的满人在渐渐改操汉语的同时，也试着为自己用汉文汉字命名。至清末，满人以汉名出现颇为普遍，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在起名时以汉字标示辈分的形式。不过，在使用名字时有一样，到终清之际，满人还是跟汉人差别明朗：他们虽都知道自己家族姓什么，却没有把姓氏挂在名字前面一起称呼的习惯，“称名不举姓”的满俗，不单在满洲旗人中间保持着，也传给了“满化”的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因为有这样的民族习惯，在目前尚能发掘到的有限的几宗清末有关公文里，凡是记录着老舍父亲名字的地方，都是只有“永寿”二字，而并非后人想象的“舒永寿”。关于旗人“称名不举姓”的习俗，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所说明：“满、蒙两族的姓氏，不著于世，辄以其名之第一字相呼为姓。流俗不察，遂以为其祖、父、子、孙不同姓矣。汉军本为汉人，有汉姓，其欲依附丰沛，以旗籍自炫者，亦效满、蒙。”（见徐珂《清稗类钞》，第21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代对于相关旗籍的习惯写法是“正红旗满洲”、“镶白旗蒙古”或者“镶蓝旗汉军”，而不是“满洲正红旗”、“蒙古镶白旗”或者“汉军镶蓝旗”。

① 有清一代，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因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生活习俗、文化观念等方面日益融会，彼此越来越浑然一体，世间长期流传着在分辨不同人社会位置时“只问旗民，不分满汉”之说，“旗人”和“民人”成了较为重要的社会分野，而一个人是出身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则相对来说不很重要。以至于到了清代的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将三个八旗的所有人员统称为“旗族”的称谓（当时并没有“满族”的概念而只有“满洲”的概念）。辛亥鼎革之后，“旗族”概念才渐渐为世间淡忘，除了原来的“满洲”人后来被指认为“满族”而外，蒙古旗人多回归于蒙古族，汉军旗人则听其自决，有些自称满族，有些回归汉族。